

浅析陈寿的传记文学观¹

——以官渡之战人物描写为中心

刘小姣²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 魏晋时期是思想极度活跃变化时期,人的觉醒在文学自觉和史学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选取官渡之战这一微观角度,从人物品评、人的价值体现、人性的审美及史学的独立性四个方面,就《三国志》在文史分野的背景下,就陈寿独特的传记文学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 陈寿;传记文学观;官渡之战;人物描写

引言

三国魏晋乱世纷争,这段历史头绪众多,内容繁杂。陈寿的《三国志》在沿用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基础上,通过为数百人作传,特别是对战争的描写,真实客观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官渡之战就是影响那个时期历史的重要战争之一。事实上,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兴起,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传统的地位也在连续的征战中倒下。就在这样文史分野的时代背景下,陈寿在战争叙事及人物描写中更好地体现了当时所特有的传记文学价值观。

一、品评风气下的人物描写

从东汉末期开始,整个三国魏晋时期一直战乱不止。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时期,传统的儒家思想处于低谷,人们开始热衷清议,玄学之风盛行。诸如《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文学作品都受时代思想影响,表现出人物品评的特点。陈寿的《三国志》也在儒学和玄学的双向影响下,在史书传记的人物描写中频繁地进行人物评价。

(一)《三国志》中的人物评价

对陈寿《三国志》从人物评价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少,成果也颇丰富。大体来说,认为

《三国志》中的人物评价主要有两种:一为直接评价,二为间接评价。^[1]史书中通过议论的方式对所记的人物进行评价,这在传记文学的开端《史记》中就有,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到班固的“赞曰”就是体现。陈寿是一位富有才识的史学家,他在人物传记篇末以“评曰”的方式继承了这一传统。^[2]坚持寓议论于叙事之中,以简严的文字,直抒史事、人物的褒贬看法,体现了魏晋时期中国史学思想所能达到的水平与高度。这也是陈寿对于传统史传文学模式的延续,是此书在史学史上的价值的体现,属于直接评价。

但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人物,除了以上的直接评价以外,从人物描写与叙事的角度来看,更有价值的应该是间接评价。即在每一篇人物传记中,边叙边评,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对其才能、性格、气质、思想、品德、业绩等某一方面进行评价。^[3]间接评价的出现就是陈寿在清谈家喜欢品评人物风尚的时代思潮下的文学体现。它使得陈寿在三国两晋易代的动乱中,能在叙事与人物传记中寄寓自己的见识。陈寿在《三国志》进行人物品评的同时,体现其人物描写的特点,表现出跨时代的史学革新意识。

1.基金项目:该文为泸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课题《文史分野下的〈三国志〉战争描写研究》(项目编号 K-1702)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刘小姣(1985-),女,四川资阳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总之,从史学来说,直接评价体现了陈寿在史传文学方面的延续,主要是他借对传主一生的直接评价来表达历史观,而其间接评价更多的是迎合了魏晋时期士人爱品评的风气,也以高简的笔法体现了陈寿在传记文学中的人物描写特点。结合官渡之战片段的人物描写,我们着重讨论的就是其二。

(二)官渡之战中品评的袁绍集团

官渡之战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所牵扯的人物很多,相关的人物品评也多,这些都主要集中于《武帝纪》与袁绍、荀彧、郭嘉等人的列传中。这场战争的主帅曹操历来备受学者重视与研究,而袁绍及其势力集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陈寿通过人物评价的方式对袁绍集团进行描写,体现他简约撰史风格的同时,也表现了富有特色的人物描写。

1. 个人品评中的袁绍

官渡之战中陈寿着重描写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是曹操,另一位是袁绍,对他们的评价一直贯穿了整个战争。对于袁绍的人物描写,陈寿仅是予以了合传,在《董二袁刘传》列传中合写了五个人的传记,故单看袁绍的列传,觉得其叙述颇为粗略简单。但细读《武帝纪》官渡之战中有关袁绍的人物描写,可见作者通过人物品评的风潮,对其人物描写与叙事的巧妙安排。

《武帝纪》中官渡之战叙述部分对袁绍的评价主要有三处。

一是战前曹操听闻“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攻许”^[4]之时,为鼓舞士气对袁绍做的评价:“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5]这是在《三国志》中借他人之口分析袁绍这个人物形象最全面的一次,也是袁绍这个人物在官渡之战中的第一次亮相。曹操作为从小和袁绍一起长大的玩伴,对袁绍的了解是很深的。现在借官渡之战曹军主帅之口对袁军主帅进行品评,是很有意义的。它既带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同时预示了这场战争袁军必败的结局。

二是官渡之战中的双方交锋后的前哨战之时,曹操欲东征刘备以除后患,诸将怕袁绍乘机攻城。曹操安慰部将:“……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6]事实上,对于这个绝好的可乘之机,袁绍果然白白放过了。在袁绍传记中,陈寿就

此做了印证:“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7]如果说第一次曹操对袁绍的评价是总体勾勒这个人物形象,第二次的品评就是对总体评价的验证。

第三次对袁绍的评价出自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荀彧。此时的官渡之战曹袁两军正是战况激烈、相持不下之时。曹军本就人寡粮少,伤亡惨重,而袁绍欲速战速决,故攻势猛烈,“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8]面对如此情景,曹操以弱应强感到力不从心,想退兵。荀彧极力劝阻曹操,在分析战况之时,再次品评袁绍:“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9]布衣本指平民,袁绍有四世三公的显赫家世,故绝不是布衣。故布衣之雄当指的是平庸首领之意。一军主帅的领导能力平庸至极,所以仅仅是能聚众而不能唯才是用。这评价反过来与官渡之战前夕所描写的那个兼四州之地、率十万大军声势浩大的袁绍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这三次有关袁绍的评价描写,都是官渡之战中至关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三次品评,不仅将战争过程交代清楚,也将袁绍这个人物的性格表述清楚。这些评价的语言既是对袁绍的人物描写,更是通过这种设计对整个官渡之战从序幕、发展到高潮进行了简洁的叙述,这恰好体现了陈寿撰史的高简特征。

2. 群体品评

官渡之战中众多人物的描写里,袁绍集团作为一个群体,受到极大的关注。陈寿在《三国志》中以独特的群体评价方式对其进行了描写。

在三国鼎立成型之前,袁绍集团是北方最大的势力,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官渡之战的出场也很是威风:“(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谏、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10]对于这个群体,曹军诸将刚开始认为不可抵挡,人心惶惶。陈寿在荀彧的列传中,通过孔融与荀彧的对话进行了群体评价:

孔融谓彧曰:“……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11]

这段对话,表面是对袁绍集团下主要谋臣武将的品评,联系官渡之战的战争形势可知,这实际是曹操谋士对袁绍集团的实力进行的分析。孔融对田丰、许攸等一千人的认知恰好印证了曹军大部分人听闻袁绍挥师北向,认为不可敌的态度,营造出紧张的战前气氛。

针对孔融的分析,荀彧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对袁绍的谋士群体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将他们的性格、才能与战争的形式联系起来。“(审配、逢纪)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12]由此分析出来,袁绍的谋士虽多,但是各个都有自身的缺点,且这些缺点刚好与官渡之战的形势发展有着联系。官渡之战进入相持的重要阶段,许攸果然因不满审配等人投靠了曹军,并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从僵局中解救了曹军,奠定曹操以弱制强的结局。

除此之外,对官渡之战时期,还未形成成熟势力的刘备和孙权集团也稍作叙述,以评价刘备和孙策的方式,将两方势力在官渡之战中所参与的情节交代清楚。这也体现了陈寿简洁的叙事手法与情节设计的人物描写特点。

关于官渡之战袁绍集团的人物分析,大多读者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失败的原因。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13]陈寿在官渡之战袁绍集团人物的突出描写中,结合魏晋人物品评的风尚进行战争叙事与情节描述,展示了这些人物的行为节操和精神思想,可谓也是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

二、人物描写中突出个人价值

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极度活跃时期,因而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都产生了社会变迁,形成适应时代的新观念体系。这种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14]陈寿对官渡之战中重要人物的品评风尚也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体现之一。但更多体现这一思潮的还是在战争中对人才、谋略的突出描绘,也反映了陈寿重视个人价值实现的历史观与军事思想。

在官渡之战中,首先双方统帅的描写中,着重比较了智能、度量、识才用人等能力。故通读《武帝纪》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很高,但印象最深刻的当是唯才是举的特征。而对袁绍为何来势汹汹却惨

败的原因,归结最大的原因当是不能识才任人。交战双方统帅是否能做到人尽其才才是官渡之战取得胜利的最大原因。既突出了双方统帅在战争中应该要有的价值,也体现了人才发挥价值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

其次,对比《左传》、《史记》等书中对重要战争的叙事来看,陈寿在叙述这场重大的官渡之战采取了简约的线条式勾勒描写,但对战争中的谋略部分却并未省略。故形成了战争过程较略,而写谋略详细的叙述战争特点。在详述战争谋略的过程中进行人物描写,特别是对荀彧、荀攸等曹操的谋士在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详细叙述,体现他们的个人价值。

其中最精彩的当数荀彧献计解除官渡之战中的白马之围,袁绍军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荀攸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15]荀攸考虑曹军兵少,故声东击西攻打袁军后方大本营,引起袁军慌乱后,再出其不备轻袭白马救出围困的刘延。其计谋不仅使曹军以弱制强地解围,并趁袁军慌乱中斩杀了颜良、文丑两大将领。这不仅削弱袁军的力量,更是打压了袁军挥师南下的士气,可谓官渡之战对峙以前精彩的前哨站。除此之外,还有官渡之战对峙过程中,曹操听从来投靠的许攸之言,奇袭袁军粮草的乌巢之战。经过火烧乌巢,打破双方僵持的局面,使得袁军措手不及的溃退。

对于这些在官渡之战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谋士,陈寿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用的互见法,详细叙述这些相关的谋略情节,将官渡之战从前哨战、僵持战到突破战中谋士们的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通过对这些谋士的精彩描绘,体现陈寿重智谋、轻匹夫之勇的军事思想,反映他重视个人价值实现的传记观。

三、审视人性的美与丑

纵观官渡之战中的重要人物描写,陈寿对袁绍集团的人物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且在描写双方战争中斗智斗勇中,也多称赞曹军一方的谋士和武将。在叙述整场战争中,陈寿也确实有意将曹袁双方的人物置于对照中描写,于比较中见真情,于剪裁处寓深意,于实录中存褒贬。^[16]花费大量笔墨,将曹操与袁绍两位主帅的形象全面铺陈开来。通过参照对象袁绍的描写,肯定了曹操的人

格魅力,重新审视了人性的美与丑,体现陈寿的又一独特传记文学观。

在官渡之战开始,陈寿对主帅之一袁绍就展开了一系列曹操不可比拟的优势描写: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乃至个人的容貌、修养,从外到内的种种条件。接着写他兼具四洲之地,携数十万大军挥师曹军,可谓气势如虹。这样的衬托下,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可谓劣势多多。但这场战争的发展并未朝着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一方倾斜,反而因其一步错,步步错,最后与曹操对垒,满盘皆输,军败而忧死。袁曹双方这样极大的实力反差,得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战争结果,本身就让读者对文本中所描写的袁绍产生不喜的态度,这未尝不是对其表现出来的人性丑陋一面的抵触。

究其原因荀彧认为袁绍和曹操是典型的强弱之势对转。他比较这两个人,一个忌刻多疑、由于难断、法令不立、好收名誉;一个唯才是用、应变无方、法令严明、诚心待人。^[17]这样对照的在战争中评价两个主帅的还有贾诩:“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须臾可定也”。^[18]可见,官渡之战中不仅曹操对袁绍的评价不高,稍有见识的人都将袁绍看得很清楚,评价都不高。这些评论本就在各个方面对人性进行了褒贬。大家推崇曹操,不如说是大家在推崇他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美德,曹操的胜利在于得到了大多数人对人性的认同。这是最明确的人性美与丑的取舍。

对官渡之战中人性美与丑的审视情节中,陈寿还着重写了曹操与袁绍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对待下属态度的对照。袁绍兵败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曾经给他谏言的谋士田丰。理由是“不用田丰的谏言导致兵败,怕被其嘲笑。其胸怀狭小如此,才真是可笑。故而官渡之战后,袁绍的谋士要么被他杀掉,要么投靠曹操。这些人的结局和选择,也证明了曹操对袁绍蔑视的评价。作者也正是这样去写,把袁绍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丑恶的一面作为人性的普遍性展开。而反观曹操打败袁绍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19]发现自己属下有很多人过去写给袁绍的信,不计前嫌统统销毁。可见曹操非凡的度量和胸怀。不仅如此,等拿下邺城,他又不念旧恶,跑到袁绍墓前去凭吊,“哭之流涕”。陈寿这样写,让我们确信曹操确实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所以,将这两个最有可能在汉末历史上发生

重大作用的人并列起来,他们的品德操守、能力作风,孰高孰低,谁有功谁有过,就一目了然。这样的人性审视中,官渡之战要说是曹操胜利,不如说是曹操所代表的、大家所认同的美的人性取胜,他胜在度、谋、武、德。故不管民间对曹操的评价如何,陈寿在《三国志》中的官渡一战倒确实体现了他对武帝的推崇。

四、体现文史分野下史学独立性

在官渡之战的人物描写中,不管在人物评价风尚、突出人才价值还是审视人性美丑这些方面来看,陈寿在体现自己独特的传记文学观的时候,也在表达他不同以往史书的文学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评价道:“魏代三雄,纪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20]与文质辨洽这一评论相吻合的战争叙事来看,陈寿在描写官渡一战中,突出体现了文字简约、取材精简的叙事风格。有读者比照《史记》、《汉书》的传记文学风格,提出《三国志》人物传记的叙事和语言描写太过“高简”的观点,故而提出“文采不足”的缺陷。

但我们再细读《三国志》中有关官渡之战的片段,以品评风尚的方式进行人物描写。通过人物的对话相互评价双方的主帅和谋士,交代战争发展的线索,不去着重渲染战争的气氛。人物对话也显示文字简朴,不似司马迁《史记》中追求语言的嗜奇爱博。为突出战争中个人价值的体现,虽详写谋略部分,却对整个战争简单勾勒,真正做到取材精简的原则。而在审视人性美与丑的部分,主要以对照的方式进行人物描写,做到明乎得失、鉴往知来,揭示出战争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些都与陈寿所处的文史分野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时期产生了文学自觉,中国的史传文学由文史不相离的状况向文史分家转化,史学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史籍中的文学色彩也逐渐淡化,直至几乎被史书科学特征所取代。^[21]故与此前的史书往往有文史不分现象相比,陈寿赋予了《三国志》在过渡时期特殊的文学价值。这也是他在经史分途的初期,自觉地对历史著作的文体形式进行了一次新探索,追求文质辨洽,力图达到辞采与史实的统一,调整史与文的关系。^[22]

因而《三国志》战争与《史记》用笔对比,虽然

人物描写与情节叙述都因高简的叙事风格不够引人入胜,但这样简略叙述的方法恰恰也是它战争描写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也正是陈寿《三国志》不同于其他“前四史”的传记文学价值。它不仅规范着此后三国历史的叙述,也为后来描写三国时期战争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取材的原型。这些都恰好形成了陈寿自己独特的传记文学观点。

小结

总之,陈寿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史学家,魏晋时期文史分野的特殊史学环境,使得他在撰史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传记文学风格。加之魏晋南北朝是思想极度活跃时期,政治割据、连续战乱加剧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这些都为陈寿撰写《三国志》营造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这些都促使他形成自己独特的传记文学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3] 庞天佑.论《三国志》的人物评价[J].史学史研究,2002(2):30-38
- [2] 李凤.《三国志》叙事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6):107-113
- [4][5][6][7][8][9][10][11][12][15][18][19]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14]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16] 孙绍华.《三国志》和陈寿的史识[J].史学史研究,1997(2):28-33
- [17] 戴燕著.《三国志》讲义[M].北京:三联书店,2017.
- [20] 周振甫著.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1] 刘小姣.三国志战争描写研究[D].西南大学研究生论文,2012.
- [22] 周国林.文质辨治:陈寿的执著追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105-112.

A brief analysis of Chen Shou's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View ——Tak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uandu war as the center

LIU Xiaojia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uzhou, Sichuan 646000)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eople's awakening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independence. From the micro angle of the battle of Guandu,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character evaluation, human value embodiment, human beaut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tory, the unique biography literature view of Chen Shou is discusse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vis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Chen Shou;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Guandu war; character description